

新保守主义与伊战后的中美关系*

潘成鑫

一、引言

在某种意义上,现在谈论新保守主义的外交影响似乎显得有些过时,因为新保守主义影响力的顶峰是在 2003 年 3 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由于对伊战争并没有如开战之前想象得那么顺利,美国军队有可能陷入一场短期内还无法抽身的战争泥潭,新保守派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于是每况愈下。不仅一些新保守派的头面人物已经离开布什政府要职,就连布什本人也开始远离新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所以,当前更时髦的题目似乎应该是“新保守主义时代的

* 作者谨向《国际政治科学》约请的六位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本文英文初稿曾在 2006 年 3 月美国加州圣迭戈市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第 47 届年会上宣读。

《国际政治科学》2006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第 91—111 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终结 和“新保守派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新保守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好像更加不合时宜。在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前后,新保守派曾盛极一时,一度把中美关系拖到冲突的边缘。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外交重心转移到了反恐战争和政权转变上。在反恐战争中,中国被认为是个伙伴,而不再是战略对手。布什现在比较看好中美关系,认为它“非常重要而充满活力”。2006年7月,美国国务卿赖斯以中国在朝鲜核危机上的合作为例,认为中国已经开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于是,人们会提出一个疑问,新保守派还继续对中美关系发生影响吗?

新保守派的势力的确今非昔比。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观念力量,新保守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可低估。这里,笔者强调的不是新保守派个人和他们的政治命运,而是作为一种外交准则的新保守主义。毕竟,是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使新保守派凝聚并逐渐壮大起来的。而且,新保守主义并非只是一个临时现象,它根植于美国外交传统中并有可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思想延续下去,尽管这一思想的追随者们现在麻烦不断。

更重要的是,像其他政治思想一样,新保守主义可以构建社会现实。只要它在美国外交界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它的社会构建效应就不应该被忽视。新保守主义带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色彩观察世界,把中美关系看做零和斗争,并针对它眼中的中国军事和道德价值威胁而主张一种进攻性的遏制包围政策。这种中国概念很可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它具有增加互不信赖的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猜忌从而强化两国安全困境的危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即使在后伊拉克战争时期,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新保守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后果。如果误以为它昙花一现,忽略它对外交政策的构建性影响,放松对其将来东山再起的警觉,中美关系就可能面临严重倒退,这样不但对中美两国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巨大冲击。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Survival*, Vol 46, No 1, 2004, pp. 7—22; and Francis Fukuyama, *After the Neocons* (Profile Books, 2006).

White House, "President Welcomes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to the White House," July 19, 2005,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7/20050719.html>

Xinhua, "Rise Says China Showing Evidence of Becoming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July 22, 2006.

本文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是对新保守主义基本原则和它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构建性影响的简要分析;其次探讨新保守派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为什么他们在后伊拉克时代仍然与美国对华政策相关;最后,本文试图展示新保守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外交政策意义,着重探讨一下其主张对“中国威胁”采取的进攻性政策如何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二、新保守主义、美国大战略与自我实现的预言

新保守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政治活动,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都有很强的相关性。本文把它理解为关于世界政治和美国国际地位的一种政治思潮。尽管新保守主义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兴思潮,但国际关系学者对它并不陌生。这不仅因为它在布什主义及其在伊拉克的试验中不可或缺,而且因为它与国际关系两大理论流派——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由于它主张通过现实主义手段来达到自由主义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新保守主义是对这两者的综合。

尽管新保守主义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相似性,新保守主义仍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认为,传统现实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过于狭隘和自私。基于对威尔逊国际主义的敬仰,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根本利益还包括在世界上促进民主与自由。不过,尽管带有强烈的威尔逊理想主义色彩,新保守主义在如何达到这些目标方面与自由主义观点相左。它认为,后者对外交手段和国际机制的依赖不切实际,因而主张借重美国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这样,强调明确的道德观念和超强的军事实力构成了国际政治中新保守主义美国大战略的双重基础。

这一大战略被新保守派发言人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甘(Robert Kagan)描述得最为透彻。在发表于颇具影响的《外交季刊》上题为《走向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的一文中,他们把新保守主义的美国国际地位观定义为“仁慈的全球霸权”。为了实现和保持这一地位,他们认为美国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4, 1996, pp. 18—32

需要“一个推崇军事优势和道德自信的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他们深信,里根主义的进攻性对俄政策促使了“邪恶帝国”的瓦解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因此,他们坚信,在后冷战时代,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应该继续有用武之地。

他们的新里根主义对外政策主张大力维护并扩张美国的军事领先地位,在国外促进民主和自由(即国家建设和政权转变),以及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单边主义行动来应对外部威胁。这些政策要素在新保守主义主要思想库“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创立宗旨中得到了清晰体现。该宗旨声称,“新美国世纪计划”倡导建立“一个强大而能够时刻应对现实与未来威胁的军事力量,一种积极而执著地在海外推行美国价值原则的外交政策和勇于承担美国全球责任的国家领导层”。同时,根据这一宗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必须包括先发制人战略,以便“在危机显现之前能够左右局势,在威胁凸现之前能够正视”的决心。2002年9月,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观点都被吸收到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经典文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中。这一战略文献在历史上首次将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

单独来看,上述每个外交战略主张都不是新保守主义的专利。比如,大多数美国战略家都同意美国应该保持其军事领先地位;自由主义者也大多希望看到美国价值观念(民主和人权)在世界传播。即使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也不是新保守主义者的新近发明,前者来源于美国例外主义,而后者则可追溯到1837年凯罗兰号事件创下的先例。但是,整体来看,这些战略主张的确使新保守主义成为一个独特而具有攻击性政策含义的国际战略理论。

尽管新保守主义近年来才异军突起,但它并非是人们常说的一时现象,也不是布什政府所独具的思潮。莱佛勒(Melvyn Leffler)认为:“布什政府与其前任政府的重要区别之处在于风格而不是实质内容。”1992年8月,33名新保守主义者和中间派外交政策专家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RebuildingAmericasDefenses.pdf>

Max Boot, "Neocons," *Foreign Policy*, No. 140, 2004, p. 21.

Michael Elliott, "Strike First, Explain Yourself Later," *Time*, June 24, 2002.

Melvyn Leffler, "Bush'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No. 144, 2004, p. 23.

半版广告声明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部分原因在于后者反对中国。所以,帕马(Inderjeet Pamar)认为,现在一个“更具进攻性的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外交新阶段的跨党派(跨自由派和保守派)共识”正在形成。

这一共识部分地来自一些由来已久、深入人心的美国原则,例如美国例外主义。就像利芬(Anatol Lieven)指出的那样,对这一原则的信任“充斥于美国政治文化和生活之中。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不过是为其增添了一种特别极端的色彩”。同时,这一共识和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密切相关,因为这已经成为数代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的信条。就像米尔斯海默所说,虽然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立场在美国饱受批评,但“其关于美国应该阻止他国崛起和保持自身在全球势力均衡中领导地位的论断却无反对之声”。

因此,是这种广泛的新保守主义共识,而不是具体新保守分子的政治命运将会长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所以,我们不能夸大新保守主义最近的挫折或者低估其政治韧性。例如,即使在不少新保守分子离开布什第二任期政府的情况下,“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一类的新保守主义观点仍然是布什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的主旨之一。同样,即使争议不断,先发制人战略在最近修订的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还是占有显著地位。

强调新保守主义共识不等于说新保守主义是铁板一块。内部争议当然存在,比如新保守主义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姿态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福山指责新保守派们在推行自由和民主过程中走了一条“列宁式”的道路,并声明

Duncan Currie, “The Clinton Paradox,” *Weekly Standard*, March 15, 2005.

Inderjeet Pamar, “Catalysing Events, Think Tank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hif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Pearl Harbor 1941 and September 11 2001,”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0, No. 1, 2005, p. 24.

参见 Jim George, “Leo Strauss, Neoconservat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Esoteric Nihilism and the Bush Doctrin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2, No 2, 2005, pp. 174—202; Michael Hirsh, “Body Necessary,” *Washington Monthly*, Vol 37, No 4, 2005, pp. 43—47; 以及 Simon Tisdall, “War Remains the Option of First Resort—Not Last,” *The Guardian*, February 27, 2003.

Anatol Lieven, “The Two Fukuyama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84, 2006, p. 127.

John Mearsheimer, “Better to Be Godzilla than Bambi,” *Foreign Policy*, No. 146, 2005, p. 48.

White House, “President Welcomes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to the White House,” July 19, 2005,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7/20050719.html>

新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我所不能支持的东西”。但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福山并非反对新保守主义本身,而是反对像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和克里斯托尔主张的过于好斗的那种新保守主义流派。福山担心这一流派会糟蹋新保守主义的理想主义核心原则,并使得自私的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沉渣泛起。所以,福山和其他新保守派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武力,而不是观念本身”。在这种意义上,这些分歧在保守派们看来“不是致命性的,相反是有益的”,因为这会使得克劳萨默所说的新保守主义逐渐“成熟为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所以,认为新保守派的战略“在理念和政策上最终行不通”可能有一定道理,而认为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已经来日无多却还为时尚早。

在社会世界中,观念很少是政治或价值中立的。观念不只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反过也会约束并构建社会实践和现实。英国哲学家温奇(Peter Winch)认为:“一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充满了他对现实的看法。事实上,‘充满’一词还不够有力:社会关系是关于现实观念的表现。”可以说,这揭示了社会构建主义的精髓。关于国际规范和机制如何改变和构建具体国家的认同已经有了大量研究,但这研究的只是社会构建的一种方式。同时,我们还应该研究相反方向上的社会建构,也就是国内规范和政治观念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并进而塑造国际关系的规范和机制。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言,“观念不只是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只要它是行动的动力和能源,它就塑造现实”。例如,冷战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构建的结果。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印象和错觉导致相互猜疑和挑衅性政策的出台。这些政策进而造成

Francis Fukuyama, "After Neoconservatism,"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06

Peter Hatcher, "Bush's Second Front,"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8, 2006, p. 28

Henry R. Nau, "No Enemies on the Right: Conservative Foreign Policy Factions Beyond Iraq,"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8, 2004/05, p. 23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Neoconservative Convergence," *Commentary*, Vol 120, No. 1, 2005, p. 26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p. 8

Peter Winch,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67), p. 23

Stanley Hoffmann, "Perceptions, Reality, and the Franco-American Conflict," in John C. Farrell and Asa P. Smith, eds., *Image and Real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57.

彼此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反过来又强化了原来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错觉成为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并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社会构建原理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影响。例如,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已经表现在新保守主义的伊拉克战争的冒险中。通过把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邪恶轴心”,新保守派策动了摧毁萨达姆政权的先发制人打击。但是,伊拉克战争却带来巨大的人间灾难和破坏,这些灾难进一步滋生出伊拉克人的绝望、仇恨和对美国的暴力反抗。这样,新保守派发动的军事冲突恰恰引发了那些起初作为战争理由的问题(例如“伊拉克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其2004年度安全概览中指出,对伊拉克的占领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在全球招兵买马的有效借口”,并可能强化了世界恐怖主义。笔者认为,新保守主义如何看待中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类似的影响。考虑到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在伊拉克的灾难性后果,对新保守主义如何看待中国和影响中美关系有必要进行批判性分析。

三、新保守主义视角中的中国

透过新保守主义的视角,新保守派认为,中国对美国作为“仁慈的全球霸主”的构想构成了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在他们眼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发展对美国的全球和地区军事优势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看起来与新保守主义对明确道德原则和扩展全球自由的追求不相符。如果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由明确的道德原则和军事优势所界定的话,显然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

于是,在“9·11”事件之前中国被赫然列入新保守派外交议程就不足为奇。早在1995年,新保守主义者克劳萨默就主张遏制中国。2000年,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出版了重要著作《当前的危险》,其中勾画了他们对美国外交和国

参见 Richard Norton-Taylor, “Occupation Has Boosted Al-Qaida, Says Think tank,” *The Guardian*, May 26, 2004.

防政策的设想。该书“增长中的威胁”部分的第一章的主题就是中国。“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创始人之一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曾经提出著名的“亚洲对抗的时机已来临”的论点。他这一论点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快速增长对稳定的破坏性和其“随之而来的对权力和应得权利的普遍感受”。如果这听起来更像新现实主义论调的话,他随后补充上了意识形态一环,从而完善了他关于中国的新保守主义的论点。他在发表在新保守主义杂志《评论》上的一文中写道:“当苏联消失后,中国显然是最有可能向美国实力发起长期严重挑战的国家。不管我们现在的领导人(即克林顿)认识到与否,美国和中国已经卷入到一场争夺亚洲主导地位的斗争中。”

与这种论调相呼应,新保守主义鹰派人物沃尔福威茨在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宣称,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在下一世纪上半叶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概念随后成为乔治·W.布什在“9·11”事件之前中国政策的主要架构。

对中国的敌视并非新保守派强烈道德立场的唯一体现。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作为新保守主义智库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副总裁的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强烈要求美国与台湾建立全面正常“外交”关系。与新保守派将道德理念贯入美国全球统治的呼吁一脉相承,博尔顿认为,正式承认台湾正好可以展示“这一地区所需要的那种美国领导地位”。同样,《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芒罗(Ross H. Munro)认为,对美国来说,“我们无法在放弃台湾的情况下而不放弃我们的核心原则”。

Ross H. Munro, “China: The Challenge of a Rising Power,”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cisco, CA: Encounter Books, 2000), p. 47—73.

Aaron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94, p. 16.

Aaron Friedberg, “Arming China against Ourselves,” *Commentary*, Vol 108, No 1, 1999, p. 33.

引自 Strobe Talbott, “U. S. -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in Christopher Marsh and June Tueffel Dreyer, eds., *U. S.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cies, Prospects, and Possibilitie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3), p. 7.

Hanish McDonald, “Beijing Draws Line in Sand on Taiwan Independenc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12, 2005, p. 19.

Ross H. Munro, “China: The Challenge of a Rising Power,” p. 51.

这是在“9·11事件之前新保守派对华战略观。但是,正如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9·11事件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急剧转变之一,是对其强烈反华立场的软化。比如,原来明显的对华遏制政策已经被“两边下注战略”所取代。不过,细究起来,新保守派的言论表明,尽管有令人震惊的“9·11事件”的发生,在新保守派那里,中国即便不是最迫切的也是一个主要的安全忧虑。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指出,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主要是由于其“回旋余地的缩小,而不是由于其决策人物观念的变化”。

显而易见,只要新保守主义坚持把推行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长远来看中国只会被当作对手而不是伙伴。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美国将“通过与恐怖主义分子和独裁者的斗争而保卫和平,通过在各大陆鼓励自由开放社会而拓展和平”。因此,虽然反恐战争有助于中美两国消除隔阂,很多新保守派坚信这并没有改变美国与中国的根本差异。比如,弗里德伯格就坚持认为美中之间的鸿沟“和‘9·11之前一样宽,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更宽了”。

因此,即使在恐怖主义袭击后人们对中美长期合作寄予厚望的时候,新保守派和他们的盟友们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警惕。2002年7月由五角大楼和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中国的两个报告就是最好证明。两个报告均发表在“9·11事件”的10个月之后,它们都反复对正在出现的“中国威胁”发出警告。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副主席、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雷丁对媒体说:“在紧要关头,中国将会非常乐意与我们开战。”“新美国世纪计划”常务主任施密特更进一步,认为美国应该充分利用反恐战争来“收

Robert Jerv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New Era*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09.

James Kitfield, "After the Revolution," *National Journal*, February 4, 2006.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pdf>

Aaron Friedberg, "September 11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urvival*, Vol 44, No 1, 2002, p. 44.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July 12, 2002; 以及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eport to Congress: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2.

引自 Joseph Perkins, "China's Coming Threat," *Washington Times*, July 24, 2002, p. A17.

紧中国的安全绳套”。

在当前伊拉克战争进退两难的时候,新保守派更有可能重新关注中国。作为“地平线上仅有的大国威胁”,中国可以向由于伊拉克战争而分化并且急需新对手的新保守派提供必要的重整旗鼓的机会。新保守派如何设想后伊拉克时期的中美关系的走向,可以从克劳萨默对二战前后美苏同盟的描述中得到部分的借鉴。他写道,苏联同盟“是一个必要但临时的同盟:在对付完希特勒之后,我们则把注意力转向了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如果这是新保守主义者对美苏同盟的理解的话,那么伊拉克之后的中美合作前景看起来确实并不乐观。

中国的持续迅猛发展似乎也无助于局面的改观。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指出,中国的崛起已使美国疑虑重重。强硬派和温和派、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同意,美国应该保持在东亚——中国的后院——的战略优势。因此,在美国外交界看来,新保守主义的防止其他国家“寻求更大的地区或全球地位”的战略并非异端邪说。而在新世纪,正如迈克尔·克莱尔所言,这一战略“只能适用于中国,因为没有其他潜在对手具备可信的积聚全球实力的能力”。在“9·11”事件之后不久,五角大楼在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不点名地警告,在亚洲将出现“一个具有雄厚资源基础的军事对手”。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明确指出:“在主要和正在兴起的大国中,中国最具备和美

Gary Schmitt, “Our Ambivalent China Policy,” *Weekly Standard*, July 15, 2002, p. 17.

Max Boot, “Project for a New Chinese Century: Beijing Plans for National Greatness,” *Weekly Standard*, October 10, 2005.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Neoconservative Convergence,” p. 25.

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Benjamin Schwarz, “Managing China’s Rise,” *Atlantic Monthly*, Vol 295, No. 5 (June 2005), p. 28.

Patrick E. Tyler, “U. 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A One-Superpower World,”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p. 11.

Michael Klare, “Revving up the China Threat,” *The Nation*, October 24, 2005.

国进行军事竞争的巨大潜能。”随着未来中国进一步崛起,这种警告声将会越来越大。

的确,在“中国威胁论”的问题上,不但新保守派内部团结一致,而且许多来自民主党左翼和保守党右翼的批评者们也加入进来。例如,在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华盛顿的当天,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描述了一幅与新保守派如出一辙的关于中国的消极画面。这位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要求布什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强硬起来,认为“只有这样我们(美国)才具有在世界其他地方为自由直言所需的道德权威”。

当然,在美国继续进行反恐战争和重点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情况下,美国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在朝鲜和伊朗问题上尤其如此。但是,中国在两国核问题上的合作并没有平息新保守派对中国的不满。200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轮六方会谈达成了关于朝鲜放弃核项目以换取能源援助的协议。尽管很多观察家将这一协议看做美中合作的结果,但新保守派却对此不屑一顾。对一些新保守派来说,这一协议不过使平壤换取了更多时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在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恰好证明其已崛起为“美国霸权的严重对手”。中国坚持反对颠覆朝鲜政权,新保守派不断将朝鲜核问题的僵局归咎于中国。例如,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报告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同样,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约瑟夫更是提高筹码,要求中国必须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决断,否则“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and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ebruary 6, 2006.

Nancy Pelosi, “Hu’s Visit Nothing to Celebrate,”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0, 2006.

Charles Krauthammer, “China’s Momen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2005, p. A23.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 3; and Bonnie S. Glaser and Jane Skanderup, “End of the US-China Honeymoon,” *Asia Times Online*, July 21, 2005,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GG21Ad08.html>

在这一背景下,近两年来很多新保守派加入到警告中国挑战的行列。2004年11月,仅仅在布什重新当选几天之后,新保守主义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盖夫尼就列出一个要求布什及其下属在第二任期完成的工作清单,其中包括发展“适当的战略”来对付来自包括中国的威胁。与此类似,福山曾经警告说:“我们不能因为反恐战争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地缘政治发展趋势的中国崛起视而不见。”2005年2月,在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高斯发出中国军事壮大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警告的第二天,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随声附和,认为中国海军在10年内就会超过美国。几个月之后,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重申这一警告。他在“香格里拉对话”的讲话中将中国军事开支视为对本地区的威胁。这一论断很快得到五角大楼2005年关于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的呼应。这一报告第一次将中国大陆不但描述为对台湾的“威胁”,而且是对东亚地区的“威胁”。

如前所述,只要新保守主义者坚信军事实力和明确的道德原则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的存在是这一构想的天然障碍,从而必须认真对待和严加防范。他们还认为,阻止中国崛起和保持美国在亚洲霸权的机会在一天天流失,所以采取遏制战略尤为紧迫。例如,在《管理中国的幻想》一文中,卡甘认为历史上现有大国试图管理新兴大国的失败例子屡见不鲜,而唯一能够确保和平与稳定的方式是“现在就至少将中国看做未来的敌人,而不是20年之后”。

Jim Lobe, “Neo-con Agenda: Iran, China, Russia, Latin America,” *Inter Press Service*, November 6, 2004, <http://www.commondreams.org/headlines/04/1106-01.htm>.

Francis Fukuyama,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 2005, p. A18.

Conn Hallinan, “Comering the Dragon,”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February 22, 2005, pp. 1—3.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5, p. 13.

Michael A. Weinstein, “China's Geostrategy: Playing a Waiting Game,” *Power and Interest News Report*, January 7, 2005.

Robert Kagan, “The Illusion of ‘Managing’ China,” *Washington Post*, May 15, p. B07.

四、新保守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虽然新保守主义的声音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它并非只有成为主流声音才能对中美关系造成危害。这种联系在“9·11事件之前即显而易见。例如,当时不少新保守派就积极参与到调查中国安全和军事政策的国会专门委员会中,这些委员会包括关于中国间谍案的考克斯委员会、关于弹道导弹威胁的拉姆斯菲尔德—多伊奇委员会,以及关于空间安全的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等等。2000年布什大选的胜利使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影响力大增。布什本人承认,在美国的紧要关头,企业研究所向美国政府提供了20名最优秀的人才。又如,2001年初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第一批12名委员中就有至少4人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等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由于这些新保守派在布什的第一任期中占据要职,导致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重心“是中国而不是恐怖主义或者伊拉克”。根据著名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观察,当时布什及其国家安全小组全力关注北京,甚至当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还不在于本·拉登身上,以至于白宫和五角大楼无法拿出打击在基地组织的现成计划。因此,在“9·11事件之前,很多迹象表明,新保守派的对华和对台政策已经开始在华盛顿政治层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这一趋势由于“9·11事件”的发生而有所改变,但了解新保守主义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主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构建包围圈、积极对华备战和支持“台独”。

(一) 构建同盟以包围中国

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的第一项内容即是在中国周边构建一个战略包围圈。新保守派学者阿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认为,中国可能向“每一个邻

Indrajeet Pamar, "Catalysing Events, Think Tank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hifts," p. 12.

Benjamin Schwarz, "Managing China's Rise," p. 27.

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pp. 25, 39.

国 开战,因此主张美国“在东亚构建一个实质性的民主国家联盟”来加强现有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并确保“战时的外交协调、安全通信和武器系统的一体化”。这些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付诸实施。例如,在与日本谋求成为“正常”国家的同时,针对中国的美日同盟最近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2005年2月举行的年度战略对话中,美国和日本在历史上首次将“保持台海和平”作为“共同战略目标”。2005年以来,美日官员一直在协商将美陆军第一军司令部从美国西海岸迁到日本神奈川县的座间基地。同时,华盛顿还计划将现在关岛的空军第13联队司令部移到东京西部的横田空军基地。

新保守派认为,澳大利亚是东亚地区唯一和美国拥有共同意识形态和高度亲缘性的核心盟友。尽管堪培拉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是美国一直极力强化美澳同盟关系。美国似乎感觉这种“轴心—辐条”式的同盟结构还不足以达到对付中国的战略目标,因而近期将原有的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由事务级升格为部长级。一位澳洲学者将这个新三边同盟比作针对中国的“小北约”。在2006年3月在参加悉尼举行的首次三边部长级对话之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强调指出,本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长期盟友,共同负有责任去创造一种保证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成为积极而不是消极力量的条件”。而在这一毫不掩饰的警告之前,布什刚刚完成对印度的历史性访问,期间美印两国达成了一项核技术合作协议。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一协议的用意之一就是抗衡中国的崛起。一个月后,在美国的督促下,北约开始寻求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正式伙伴关系。尽管北约向中国承诺这不是针对中国,但是这一基于“新保守派的新幻想”的最新事态发展不会降低而只会加深中国对

Arthur Waldron, "Our Stake in Taiwan," *Commentary*, Vol 118, No 3, 2004, pp. 63—65.

参见 Richard Halloran, "Guam to Become the 'Pivot Point' for the US Pacific Forces," *Taipei Times*, March 14, 2006; Simon Tisdall, "Japan Emerges as America's Deputy Sheriff in the Pacific," *The Guardian*, April 19, 2005.

Aaron Friedberg, "Asian Allies: True Strategic Partner,"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cisco, CA: Encounter Books, 2000), p. 208.

Pumendra Jain, "A 'Little NATO' against China," *Asia Times Online*, March 18, 2006,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HC18A01.html>

Geoff Elliott, "Hawkish US Wams of 'Negative' China," *The Australian*, March 11, 2006.

Paul Richter, "In Deal with India, Bush Has Eye o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4, 2006.

美国主导的战略包围圈的疑虑。

如果加上此前美国与印度尼西亚谈判在苏拉威西岛建立海军基地,以及加强同泰国、新加坡、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中亚各国军事纽带等种种举动的话,这种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意图则更加明显。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曾颇为赞许地指出,现在美国已经悄悄地以在檀香山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为核心形成“一个太平洋军事条约组织”。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沃尔特·米德看来,这一行动正在顺利完成一种“警示中国不要胆大妄为”的“战略网”。当然,很多人认为,这事实上是对中国的“两边下注战略”,与新保守主义并无特别关系。但是,笔者认为,与新保守派露骨的遏制包围政策相比,这一战略似乎对维持一个非敌对的中国抱有希望,不过它并非与后者是不兼容的。因此,被融入到“两边下注战略”中的包围政策并不见得更加友好,更不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已在制定对华政策中无足轻重。正像比尔·格茨(Bill Gertz)报道的那样,“公开讲(对华)战略是‘两边下注’,但在五角大楼内部讨论中,它意味着‘积极备战以快速打败中国的进攻’”。

(二) 积极对华备战

新保守主义评论家麦克斯·布特指出,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固然可取,但是“要想使其可靠还必须以武力作后盾”。这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三重奏的另一主要环节是积极备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公开同北京就货币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较量的同时,布什政府暗地里正忙于准备一场可能出现的对华战争”。这些准备步骤包括由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部门所主持的一系列战略评估和调整。例如,2002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透露了美国对中

Patrick Goodenough, "NATO Eyes Partnerships in the East," *CNSNews.com*, April 28, 2006; Gabriel Kolko, "American Visions for Expanding NATO Include Australia," May 5, 2006, <http://www.scoop.co.nz/stories/HL0605/S00096.htm>.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Atlantic Monthly*, Vol 295, No 5, 2005, p. 50; cited in Simon Tisdall, "US Tries to Spin a Web Strong Enough to Contain China," *The Guardian*, August 10, 2005.

Bill Gertz, "Pentagon 'Hedge' Strategy Targets China," *Washington Times*, March 17, 2006.

Neil King, Jr., "Conflict Insurance: As China Boosts Defense Budget, U. S. Military Hedges Its Bet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06, p. A1.

国以及一些“无赖国家”进行核打击的计划。2004年7月,在代号为“夏季脉动04”的军事演习中,美国首次在五个战区集结了七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主要目标直指中国。同时,以应对中国为由,五角大楼还在进行一系列军需采购,其中包括昂贵的新型远程轰炸机。

在一篇题为《我们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中,卡普兰坦率地透露,美国已决定将在关岛长期部署的核潜艇由3艘增加到10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全天候空军基地,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现在储备有大约10万枚炸弹、导弹以及6千万加仑的航空燃料。鉴于其地理位置与中国相对临近,为什么关岛会成为美国军事重新部署的焦点就自然很清楚了。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威廉·哈洛伦(William Halloran)指出,关岛是在应对亚洲紧急事态中军队、舰只和飞机集结的基地。而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詹姆斯·托马斯则更加明确地承认,“向关岛更加经常部署轰炸机”是对中国“两边下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大力支持“台独”

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军事力量需要为道德准则服务。因此,其对华政策的第三要素即是同情和支持“台独”。在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中,新保守主义“机关报”《旗帜周刊》的编辑卡甘和克里斯托尔迅速抓住这一时机,要求新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更为先进的武器并同时遏制中国。他们写道,向台湾“出售宙斯盾巡洋舰是回应中国行为的唯一正确做法”,并且认为“积极遏制中国是保持和平的唯一出路”。尽管布什没有完全言听计从,但他还是批准了十多年来最庞大的对台一揽子军售交易。不过,直到现在,台湾“立法院”仍然无法通过这笔庞大交易的预算案。另外,在撞机事件后不久,布什

Neil King, Jr., "Conflict Insurance: As China Boosts Defense Budget, U. S. Military Hedges Its Bet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06, p. A1.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pp. 58—59.

Richard Halloran, "Guam to Become the 'Pivot Point' for the US Pacific Forces"

Bill Gertz, "Pentagon 'Hedge' Strategy Targets China"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A National Humiliation," *Weekly Standard*, April 16—23, 2001, p. 11.

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Administration of George W. Bush and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No 40, 2004, p. 467.

偏离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模糊战略,宣布美国将“尽一切所能 帮助台湾“自卫”。

在布什明确对台防卫承诺的鼓舞下,新保守派不断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台政策。2002年3月,美国在中美建交13年后第一次向台湾“国防部长”参加“美台国防高级会谈”发放签证。台湾“国防部长”“私下”会晤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和当时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4年度报告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实变化”为由,反复要求国会和布什政府对“一个中国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2004年2月,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理查德·劳利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解释说,不仅美国法律要求美国对台湾防卫给予全力协助,而且认为这是保卫“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举”。同时,劳利斯还披露了美国和台湾的全面军事合作情况,包括向台湾提供军需物资和服务,发展一体化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共同理念,以及发展联合力量的统一训练、动员和供给能力。

在扶持台湾的同时,美国还积极游说并成功阻止了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一位美国官员解释说,如果解除禁运的话,欧盟对华武器出口将使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中国大陆一边倾斜。显然,他的潜台词是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美国将被迫进行干预。

(四) 作为自我实现预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上述政策并非只是新保守派的专利。在美国的不同政治派别中都可以找到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不同的是,新保守派同时坚持这三项政策,并希望以此向中国传达美国军事优势的信息,说服中国放弃挑战美国。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政策是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回应,但它更主要是美国接触政策而非遏制政策的结果。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三重奏建立在一种夸大的“中国威胁论”观念之上,更容易制造两国冲突,使“中国威胁论”变为现实。如果炫耀武力对于像伊朗和朝鲜那样的一些小国都不能奏效的话,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更容易顺从美国的压力。为了经济增长中国已经对国际稳定和自身国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pp.9, 125.

John Tkacik, Jr., "US Is Preparing a Stick for China," *Taipei Times*, February 10, 2004.

引自 Greg Sheridan, "Howard Steers Between Giants," *The Australian*, February 12, 2005.

际形象更加关注,但这不等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军方)会在任何情况下都顺从美国的强硬立场,当中国认为自己核心利益(比如防止台湾“独立”)受到影响时,这些政策的可行性就尤其值得怀疑。

我们可以以新保守派关于中国对美国的能源安全威胁为例来说明。2001年5月,美国发布了《国家能源政策》报告,其中指出将“能源安全作为美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重心”。值得注意的是,能源安全一直是与能源巨头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保守派的关注焦点。他们认为,石油价格的动荡是对“美国权力的最大威胁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也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为此,中国已开始在全球各地寻找石油资源。2005年,在竞标收购美国尤尼科(Unocal)石油公司时,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公开表示:“中国的目标不是颠覆世界秩序,而是希望参与并强化世界秩序而从中收益。”但是,很多新保守派(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认为,这一收购举动居心叵测。尽管尤尼科公司的石油产量只占美国石油产量的0.8%和消费量的0.3%,美国众议院还是以398票对15票否决了这项收购,理由是这项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此,中国方面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尽管围绕这一竞标的争议已经结束,但其对中美关系的长期负面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美国在尤尼科问题上的举动恰恰“会导致其所担心的敌意”。美国对尤尼科交易的反对以及副总统切尼对中国试图收购加拿大沥青砂的不悦,都在向中国表明,北美洲没有中国的立足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只得另寻他途,将目光转向像伊朗、苏丹、

引自 Michael Klare, “Bush-Cheney Energy Strategy: Procur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s Oil,” in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ed., *FPIF-Petro Politics Conference Report*, January 2004, p. 4.

Paul Roberts, *The End of Oil: The Decline of the Petroleum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a New Energy Order* (London: Bloomsbury, 2004), p. 110.

参见 David Zweig and Bi Jianhai, “China’s Global Hunt for Energy,”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2005, pp. 25—38.

Stephanie Kirchgaessner, “China’s Oil Scramble ‘Does Not Damage U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8, 2006.

Peter Grier, “Unocal Deal Tests US Stance toward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18, 2005.

David Barboza, “Chinese Company Ends Unocal Bids, Citing Political Hurdl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 2005.

“America’s Summer of Discontent”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2005.

津巴布韦、缅甸和委内瑞拉等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被新保守派所指责的“问题国家”。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又因此得到进一步扭曲。例如,2006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指责中国试图将能源供应源据为己有和扶持制造麻烦的政权。这些负面印象无疑会为美国政府采取强硬对华政策提供更多的借口。

在台湾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2005年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指责中国军事力量透明度不够。不久,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就及时重申提高台湾岛“自卫能力”的重要性。由于有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台湾当局近年来不断朝“独立”的方向发展。在2006年短短的两个半月之内,自称“深受布什思想影响”的陈水扁首先是在元旦讲话中表达了“修宪”的意愿,然后在2月份实际上废除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国统会”。

在其近著《美国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中,美国卡托研究所的卡彭特(Ted G. Capenter)对美国的支持和“台独”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只会鼓励台湾强硬派不断在“独立”问题上打擦边球,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如何美国都会保卫台湾。但是,这样必然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美国最明确的威慑态势都不足以阻止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学者斯温(Michael Swaine)认为,美国如果认识不到其政策对中美关系的潜在影响而一意孤行的话,那就是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

这种危险性在于,由于中国把台湾视为其至关重要的核心利益,无疑美国的上述对台政策将会使该地区的敌对进一步升级。例如,针对美国“夏季脉动04”军事演习,中国军方声称,这“将使得中国除了以闪电速度完成对台湾的战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nss2006.pdf>

Roger Mitton, "Rumsfeld's Words Show Worsening Sino-US Ties," *Straits Times*, June 9, 2005.

"Chen Promises to 'Do Right Thing' for Nation," *China Post*, February 4, 2006.

Ted Galen Carpenter, *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Roy Pinksler, "Drawing a Line in the Taiwan Strait: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Its Discontent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7, No 2, 2003, p. 357.

Michael Swaine, "Reverse Course? The Fragile Turnaround in U. S.-China Relations," *Policy Brief*, No 22,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p. 6.

争之外而别无选择”。在这场军演之后,北京第一次任命了两位熟悉反航母作战的官员任副总参谋长。对此,肯尼思·谢尔曼(Kenneth B. Sheman)写道:“‘夏季脉动 04’集结的七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定是震动了中国军方高层。”中国和俄罗斯 2005年 8月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同样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事件以及新美日同盟的反应。汤姆·普拉特(Tom Plate)对这种螺旋升级模式进行了精辟描述。他写道:“关于美国大规模军事集结的谣言往往会被中国军方的强硬派所利用,他们会要求北京斥资扩充军备,而同样原因这会被台湾鹰派人物所用,反过来又为美国的反华势力提供借口以寻求更多军费和军事装备,而所有这些又都正中美国军火商下怀。一种恶性、代价高昂而无谓的军备竞赛气氛正是通过这种旋风式的谣言、恐惧和影射攻击而形成的。”

五、结 语

当然,新保守主义只是复杂的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变量。中美关系的发展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难以预测。尽管如此,新保守主义仍然是这一重要双边关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尽管为伊拉克战争所困扰,新保守派们并没有忘记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对美国“仁慈的全球霸权”的军事和道德的双重威胁。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们又明显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因此,在中国进一步强大的同时,他们的影响也将可能继续增长。尤其重要的是,虽然他们的伊拉克政策危机重重,他们对无可匹敌的美国霸权的构想及其以进攻来遏制中国的政策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分析了新保守主义对华战略的政策意义与影响,认为这一战略与一种正在兴起的“构建包围圈、积极对华备战和大力支持‘台独’”政策密切相关。与新保守派希望抓住当前历史机遇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的

Ching Cheong, "US Plans Huge Show of Force in Pacific," *Straits Times*, June 30, 2004.

Kenneth B. Sheman, "Flashpoint Taiwan Straits," *Journal of Electronic Defense*, Vol 27, No. 11, November 2004.

Wu Xinbo, "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 S. -Japanese Allianc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5/06), pp. 119—30.

Tom Plate, "When the Press Reports a Net 'Blockbuster,'" *Straits Times*, July 22, 2004.

愿望相反,笔者认为,新保守派的对华战略只能加剧中美之间相互敌对,甚至引发两国冲突,从而形成一种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基于这种冲突的严重后果和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深远影响,现在正是认真对待新保守主义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恰当时机。

www.cnki.net

作者简介

向钢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1985年获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理工大学工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威慑、军事决策与博弈分析。

电子邮箱: xianggh_03@em.tsinghua.edu.cn

王永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66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工业企业电气化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决策理论与管理决策优化。著有:《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与战略》(2000年)、《运筹学》(1993年)。

电子邮箱: wangyx@em.tsinghua.edu.cn

王莉欢 1986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在新加坡政府任职。

电子邮件: laifoonwong@pacific.net.sg

阎梁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1995和2001年分别在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任助理研究员。著有:《社会危机事件处理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

电子信箱: yanliang05@mails.tsinghua.edu.cn

潘成鑫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院讲师。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为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安全。论文曾发表在 *Alternatives, Political Science* 等学术刊物上。专著 *Underst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an Emerging Superpower*, 将由英国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出版。

电子信箱: chengxin.pan@deakin.edu.au

李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200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

电子信箱: kindyleeway@gmail.com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7、1990和199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政治、中美经贸关系。著有:《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年至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1998年)、《知识经济对策:运作与案例》(1998年)。

电子信箱: yowang@pku.edu.cn